

中学教师应该具备的学科基本素养

——以中学历史教师为例

陈梧桐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中学历史教师要把课讲好, 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教师, 应该具备任职学科的基本素养: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 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拥有历史基本知识, 明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脉络; 熟悉史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关键词:史学理论; 唯物史观; 历史知识; 史学研究方法; 逻辑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9)05-0083-09

我们的中学教师, 都是经过有关部门的考核, 取得教师任职资格而走上讲台的。但这只是起码的任职资格, 要把课讲好, 成为一名真正合格乃至优秀的教师, 还必须具备任职学科的基本素养。就中学历史教师而言, 就是要掌握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本文即以中学历史教师为例, 谈谈教师们所应具备的学科基本素养。

一、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作为中学历史教师, 首先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 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组成。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 历史观和以它为核心的史学本体论占据主导地位。历史观是指人们对于历史的根本看法, 或者指人们对于人类历史

运动及其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它是史学的灵魂, 也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观是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中产生, 并随着社会生活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中国古代,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史学的发展, 曾经形成各种形态的历史观, 如天命论史观、循环论史观、帝王中心论史观, 等等。在欧洲, 从中世纪的神学史观, 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观, 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雄史观、进化论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史观, 一直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历史观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 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 这些历史观都是用唯心主义来说明和解释历史, 都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

在唯心史观占统治地位的史学领域, 尽管有的史学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材料, 却无法全面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给

作者简介:陈梧桐, 1935年生, 福建安溪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著有《朱元璋大传》《明史十讲》《黄河传》等多部著作, 多次参与人教版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予科学的说明。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唯心史观的弊病：“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那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1]40}列宁进一步指出，唯心史观的两个主要缺点是：“第一，以往一切史学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总之，唯心史观以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说明和解释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未能看到物质生产及社会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因而也就看不到物质生产者——劳动人民群众的活动及其作用，所以也就无法探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他们把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研究，阐明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克服以往一切史学理论的弊端，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他们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3]。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这样，人们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便创造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同时，人们也必须相应地展开经济交往、社会交往、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实践活动，这就创造出相应的经济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社会交往形式即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政治交往形式即政治制度和体制，以及精

神交往形式即意识形态。这些交往形式逐渐稳定下来，便成为人们世代相传的既定的交往条件。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必然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意识。”^{[4]82}这就揭穿了唯心史观的人们的意识决定历史发展的骗局。

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政治与精神交往形式，推动着它们的发展，同时也在推动着“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因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农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在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5]82}。在这种新的需要的推动下，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得到发展的人们，就会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把生产力推向新的高度。于是，现存的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4]83}。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此时，社会革命也就到来，旧的生产关系就会为适应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旧的上层建筑就会为适应经济基础的新的上层建筑所取代，社会形态也就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旧的矛盾解决了，生产力再向前发展，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又与之发生新的矛盾，于是又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再度发生变革，使社会形态向更高一级发展。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从总体上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这就是：人类通过物质生产

活动，不断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从手工劳动的小生产发展到社会化的大生产，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劳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从而推动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推动着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经过各种形态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唯物史观的几个基本原理。第一，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通常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矛盾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个说法并不错，但引发这个矛盾的正是人们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推动着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这个矛盾的解决归根结底又取决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推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二，在一般的情况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也应该看到，上层建筑一旦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或者是正面的促进作用，或者是反面的阻滞作用。马克思就曾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发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6]恩格斯也指出：“虽然物质生活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第二性的作用”^{[7]474}。

第三，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恩格斯又提出“力的平行四边形”原理，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7]478}当然，这些合力中的各种力量并不起着同等的作用，是有主有次的，也并不是都起相同方向的作

用，是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

第四，人类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运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其发展变化，有渐进与突变两种方式。当渐进的量变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就会引起质的飞跃，社会革命就会到来，实现从旧质态向新质态的变化。这种社会革命可以是暴力革命，如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可以是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如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

第五，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等于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个人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大小，又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归根结底，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创造着历史。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不断涌现许多新的史学理论和新的历史观，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等等。其中，有的是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的则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对此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凡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可以适当加以吸收；凡是违背唯物史观的，属于唯心史观范畴的，则应加以抵制与批驳。不能觉得新鲜，不分青红皂白，拿到篮里就是菜，全盘照收，甚至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传播。

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我们的中学教师挤出一定的时间，认真研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有关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同时，还需要阅读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名著，对照着进行思考，为何在同一类的历史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会如此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同时进一步思考，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哪些观点是必须批判和摒弃的，又有哪些见解是可取并且应该吸收的？只有经过认真的研读和思考，你才能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二、拥有历史基本知识

由于课时的限制，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可能全

面、系统地讲述中国和世界从古到今的历史，而是采取以点带面的写法，择取若干关键的节点，串连成线，来反映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概貌及其发展规律。这种写法，必然使教科书出现许多缺环和空白。教师必须拥有历史基本知识，明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脉络，才能准确地领会教科书编写的意图，对其内容做出正确的诠释，抓住重点和难点，把课讲深讲透。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一切过程都是它的研究对象，人类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中积累的所有知识都是历史知识。这个知识宝库不仅内容极为丰富，而且涉及的范围也极为广泛。一部中国通史，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边政、民族、宗教、文化、科技、教育、典籍、民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可谓包罗万象。仅中国古代史籍就浩如烟海，以至于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如何读起”之叹。而中国古代史又只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古代史之外，还有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中国史之外，还有世界史。再说历史学又同哲学及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口学、民俗学、地理学、军事学、文学、艺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数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也有着程度不一的联系。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它们内部各个学科的日益渗透与接近，世界科学正在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因此，史学工作者必须“习六艺”“百事通”，发奋攻读，努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广披博览，逐步积累起丰厚扎实的历史知识。

当然，正如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9]知识的海洋无边无际，人生却很短暂，不可能读尽世界上的书籍，穷尽所有的知识。中学教师的教学任务又十分繁重，空余时间非常有限，更不可能漫无边际地涉猎，见到什么书都读。因此，讲究效率，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就需要处理好涉猎与精研、纵观与横观以及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等问题。

我们中学历史教师，古今中外的历史课程都得教，因此有人认为他们只要广泛涉猎各种当代史学著作就行了，不必有自己专攻的领域。事实上，许多优秀的历史教师都有自己的专长，或者在中国史的某个断代史领域，或者在外国史的某个国别史术有专攻，或者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某个专门史有较深的造诣，因此他们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就能够抓住要点难点，讲得生动透彻、深入浅出，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激发学习兴趣。这就涉及我们的历史教师在积累历史知识时，如何处理广泛涉猎与专精研读的关系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博”与“约”的关系问题。对此，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从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角度作过论述，他说：“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他主张，在处理博与约的关系时，应“以约为主”^[10]。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更明确指出：“凡做史学的人，必须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他认为：“专精同涉猎，两不可少。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最佳。”他要求学史工作者处理好涉猎与专精的关系，说：“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研究，练习搜罗材料，判断真伪，决择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如此做去，极其有益”。^[11]

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情况千差万别，不仅学历不同，而且走上教学岗位的时间也不一样，有的是刚任教不久的年青人，有的则是执掌教鞭多年的壮年人，甚至是资深的老龄教师。不管学历和资历如何不同，只要是从事中学的历史教学工作，都必须掌握从事这一工作的历史基本知识。这个基本知识大抵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两门通史和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等。其中，两门通史是主干和基础，它们讲述了中外历史的主要进程和基本规律，而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则是其细化与补充。另一部分则包括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心理学、历史地理等学科的基础常识。我们中学历史

教师，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掌握广泛涉猎与专精研读的时间分配比例，而不可一刀切。如果是刚刚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不久的年轻教师，就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掌握这些历史基本知识上，打下扎实的基础，而不急于去做专精的研读。待到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能够胜任教学任务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开辟自己的研究领域，把更多的时间投入专精的研读上面，逐步过渡到“以约为主”，最后做到在教学之余，“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工夫”，“以十之一二，做涉猎的工夫”。

我们在阅读各种史籍时，还要做到纵观与横观相结合，在时间与空间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历史活动是与空间和时间紧密相连的。恩格斯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91}历史活动也离不开空间和时间的存在的基本形式。历史的时间是一个纵向的动态系统，历史的空间则是一个横向的动态系统。在历史的屏幕上，景随时移，人随景长，在时空的连续的变易中，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在阅读史籍中，既要纵向的考察，又要横向的考察。

所谓纵向考察，就是考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把握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探寻从前一个阶段进入后一个阶段的条件及原因，后一个阶段又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一个阶段，等等。比如我们观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既要了解从战国秦汉到明清的全过程，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又要弄清魏晋南北朝不同于战国秦汉、隋唐五代不同于魏晋南北朝，宋元不同于隋唐五代，明清不同于宋元，弄清其成长、发展、再发展和衰落的不同特点。这种纵向考察，既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貌，又可以在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下考察每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恰如其分地确定其地位与作用，避免过分夸大或低估其意义。比如要想了解均田制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就要系统梳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历史，才能弄清它在北齐出现的原因，它在隋、唐两朝的发展演变及其对调整当时社会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又比如想弄清明太祖朱元璋复兴传统文化的

意义，就需系统考察自秦汉至明清的思想文化史，了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经过魏晋南北朝，道、释兴起，三教互相碰撞与角逐，儒学受到严重的挑战，但在唐宋又复巩固其独尊的地位。到了元代，嗜利黷武的忽必烈虽然附会汉法，施行“外汉内蒙”的国策，但仍坚持蒙古文化本位的体制，使儒学丧失独尊地位，儒士也被边缘化。明太祖针对元朝的弊政，施行复兴传统文化的国策，尊孔崇儒，倡导理学，兴办学校，推行科举，普施教化，移风易俗。他的后继者沿袭这个政策，使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得到广泛传播，并渗透到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当明朝的统治覆亡之后。入关的清朝统治者虽仍坚守满族文化，但实行的却是“外满内汉”的国策，儒学的独尊地位并未改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仍在缓慢而曲折地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明太祖复兴传统文化的举措，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文化就未必是现在的面貌了^[12]。

所谓横向考察，就是考察某个阶段或某个时期历史活动各个方面的关系及其总的特点。比如我们要了解某个时期的社会经济，不仅要了解内地的社会经济，也要了解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讲到封建社会某个阶段阶级关系的变化，不仅要讲农民阶级的变化，也要讲到地主阶级的变化；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还要考察西方封建社会的情况，两相比较，从而彰显并归纳出中国的特点，进而引出正确的结论。近年来，一些学者采用横向考察的方法，对明代后期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发现此时在经济上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经济也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生活上逐利与奢侈之风盛行，违礼越制的现象层出不穷，政治上出现由改革运动、党社运动与市民运动构成的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思想界涌动着一股反对传统束缚、抨击专制集权、倡导人的主体地位和满足人的生理和物质欲望、肯定工商皆本的启蒙思潮，在科技界，在对传统科技进行总结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的科技成果，并倡导实验手段和数学语言的运用。所有这一切，表明明后期已显现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

会转型的曙光，从而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一再重弹的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老调。^{[14][15]}

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在广泛阅读各种史著，吸收各种历史知识时，还应注意追踪史学前沿的研究动态，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否则，人家已经否定的史料你还在引用，人家已经否定的论点你还在费劲地加以阐述，那不仅要闹大笑话，而且也妨碍自己水平的提高。所谓最新的研究成果，指的是新近发表的在史料和观点上具有新突破的论著，并不是所有新发表的论著都算是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有些新发表的论著在史料或观点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属于炒冷饭的东西，更有些新发表的论著，虽然受到某些人的吹捧和热炒，但其征引的史料却经不起检验，观点也是谬误百出。例如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译成中文于1982年出版后，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还曾被列入高中生的阅读书目。事实上，这是一本“以论带史”“以偏概全”，歪曲历史事实、宣传错误历史观的著作，怎能作为新的研究成果加以吸收呢？因此，对新发展的史学论著，不能通通视作最新的研究成果，一概加以吸收，而是要看它是否得到史学界同人的认同，更重要的要亲自作一番审慎的检验。检验的方法有三，一是史料的检验，检查其所引用史料的真伪，是否有大的遗漏，是否有新发掘的史料。二是逻辑论证的检验，查看其逻辑论证是否严密，有无漏洞。三是社会实践的检验。历史的长河是不可割断的，近现代史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有的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还在发生作用，就是古代史的一些东西，它的残迹还在当今社会中产生影响，如封建主义的残余。而且由于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发展并不平衡，中原内地早已消失的母系父系氏族制、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等，在解放前后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当中也还存在，甚至在外国某些民族当中还可找到。论述这些制度的论著，即可从中找到印证检验的资料。新发表的论著如能通过这种检验，就应当肯定、吸收；否则，就应该否定、抛弃。

三、熟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学历史教师还应熟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搞点史学研究，以收研教相长的功效。这就

要求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熟悉史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关于史学研究的基本程序，笔者已在《与中学教师谈论文的写作——以中学历史教师为例》^[16]一文中作过论述，此不复赘。史学研究的方法则多种多样，这里也不可能逐一详论，只拟着重谈谈众多研究方法都要涉及的逻辑方法的一些问题。

（一）分析与综合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思维中的运用。分析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就是把历史客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种因素来加以考察，了解其内在联系，得出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中，分析方法大抵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方面分析，就是对历史客体内外部联系的各种矛盾方面进行分析。例如研究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战争、战役，往往将其分解为作战动机、战争性质、军事机制、指战员的素质、士兵的士气、战略战术，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作战机遇等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考察，总结出战争胜败的原因。拙作《论朱元璋取得反元斗争胜利的原因》一文，就是对比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和其他农民起义领袖以及元朝方面的情况，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略；狠抓积粮训兵，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注意礼贤下士，优待降人；具有优异的军事才能，正确地指导和进行战争，这些就是朱元璋所以取得反元斗争胜利的基本原因。”^[17]二是阶段分析，就是对历史客体发展过程中所显现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矛盾进行分析，进而认识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及其规律。例如顾斌的《明末农民战争史》，就是把明末农民战争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等几个阶段，每个大阶段又分为若干个小阶段，逐一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进而对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战争的过程以及最后失败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8]。三是层次分析，就是对历史客体的本质与外部表现相联系的层次进行分析。比如评价汉武帝的历史功过，即可分析他的政体改革、财政改革等举措，得出他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的认识；分析他对匈奴的战争和对西域的外交活动，得出他发展和巩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分析他猜忌臣下甚至亲生儿子的行为，得出他残忍专横，个人权力

欲十分强烈的认识；分析他大兴土木、封禅、求仙等活动，得出他奢侈、迷信、好大喜功等的认识；分析他苛剥农民与镇压农民起义，得出对他的地主阶级本性的认识；分析他颁发“轮台罪己诏”和改变治国方略，得出他头脑比较清醒，能为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调整政策的认识。通过各个层次的解剖，汉武帝作为汉代有作为的封建君主形象和本质便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将综合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就是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客观历史事物的本来面貌和联系，把历史客体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组合成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从而达到对历史事物的整体的全面的本质的认识。比如清末的洋务运动就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在政治上有维新变法，在经济上有民族工业的兴办，在思想文化上有维新思想、中学与西学之争。政治方面又可分为不同政治集团和势力，经济方面又可分为不同性质的生产方式，思想文化方面又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这几个方面，又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只有在对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作用与影响，并抓住要点和特点，才能形成对洋务运动的本质的认识，看出它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进行综合研究，首先要有整体观念，研究国别史时，要把它放到世界史的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断代史，要把它放到通史范围内考察；研究某个局部的史事，要把它放到全局范围内考察；研究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某个现象，要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其次，要着眼于历史客体的内在联系性。历史客体作为一个整体，既不是各种现象的偶发聚合，也不是各种要素的胡乱堆积。在这里，部分与部分，局部与整体，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进行综合研究，要注意发现和揭示历史客体内部各部分以及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必然性联系。再次，要按照历史的本质进行综合，防止表象的、片面的综合。

（二）归纳与演绎

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在一定的意义上

说，是分析与综合的进一步发展，是分析与综合方法在推理过程中的特殊表现。归纳法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从个别导出一般的逻辑方法。史学研究的归纳法，是通过挖集大量的史料并且分别加以研究之后，概括出这些史实的一般属性，引出共同的结论。它对于判明历史现象的本质、主流、因果关系和其他关系很有帮助。例如毛泽东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中，从希特勒、沙皇、中国皇帝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倒台等历史事实，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往往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19]历史归纳的形式很多，比较常用的有枚举法与统计法。枚举归纳法，就是根据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的部分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推导出该类事物的全部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例如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大的骄傲导致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失败的事实，引出骄傲必然吃亏的结论，他写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20]统计归纳法与枚举归纳法相似，都是通过研究同一类事物中的一部分个别对象而作出关于全部同类事物属性的结论，不过枚举法作出的是关于整类对

象的普遍的结论，而统计法作出的是关于这类对象的概率的结论。所以统计推理不仅要进行枚举，还要进行计算。这种统计法，在经济史的研究中用的比较多。

运用归纳法来研究历史，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用于归纳的同类事例不得少于两个，而且越多越好。少于两个就成为孤证，“孤证不立”，是无法进行归纳的。反之，归纳的事例越多，结论就越加可靠。其二，一旦出现了反证，结论就需修正或放弃。其三，不宜作轻率概括，更不能作偏见概括。所谓轻率概括，就是在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史料以供归纳之前，就轻率地下结论。这种结论往往是不可靠的，难以服人。例如有部名叫《河殇》的电视政论片，把中国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分别概括为黄土文化和蔚蓝色的海洋文化，说前者保守，而后者开放。这显然是一种轻率概括。因为中国古代也有过海洋文化，先秦的东夷、莱夷就属于海洋文化，宋元时期的航海活动也都相当发达，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更把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推向了高峰。西方文化，也不全部是蔚蓝色的。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确实有过蔚蓝色的海洋文化，可是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文化比中国还要封闭，一千多年没有蔚蓝色，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又有了发达的海洋文化。所谓偏见概括，就是有意无意地从某种偏见出发，不考虑据以概括的史实或史实的代表性，只按照自己的意愿、习惯思维或意图，甚至歪曲史实，进行主观的概括。这样概括出来的结论，当然是不可能站住脚的。过去西方一些人写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往往就充斥着这种偏见概括，结论与史实相去十万八千里之遥。

演绎法则是从一般性的结论出发，推导出个别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具有相同的属性。人们的认识活动，大多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以前人认识结果的一般原理为指导进行的。唯物史观是从人类对历史认识的成果中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一般原理，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使用的就是演绎法。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许多国家和民族历史的研究，总结出人类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总规律，许多史学著作就运用这一原理来论述本国、本民族的历史。

运用演绎法来研究历史，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用于演绎的前提必须正确，前提不正确，演绎推理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例如，有的学者把中国古代史上的匈奴、契丹、女真、蒙古等视为外族，将他们建立的政权划为外国，这个前提错了，他们据此推导出来的这些政权与汉、唐、宋、明的战争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说法也就站不住脚了。须知这些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国境内，他们的政权虽然与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处于对立状态，但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与汉族中原王朝的战争，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同春秋战国时期众多诸侯国之间，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战争一样，并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21]第二，演绎的形式必须正确，演绎推理的结论所断定的概念范围不能超出前提。比如，我们说农民起义领袖、民族英雄、科学家对祖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你不能因此说李白、杜甫既不是农民起义领袖、民族英雄，也不是科学家，没有对祖国的历史发展作出贡献。因为这个演绎推理的形式不正确，推理的结论所断定的“对祖国的历史发展作出贡献”超出了前提，前提只是说农民起义领袖、民族英雄、科学家对祖国的历史发展作出贡献，并没有说文学家不对祖国的历史发展作出贡献。

（三）抽象与具体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以抽象再上升到具体，是一种重要的逻辑思维方法。用公式来表示，即具体—抽象—具体。这里的抽象是对具体而言的，指的是“思维抽象”。头一个“具体”指的是感性具体，即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后一个“具体”指的是思维具体，是在思维中再现事物的整体。感性具体虽然具体、生动，但却是表面的、笼统的认识，要达到本质的认识，就要通过抽象的环节。所谓抽象，就是在思维中，把对象的某些本质的属性抽取出来，而舍弃其非本质的属性，形成抽象的规定。这种思维抽象已经接触到事物的本质，但它只是从某个方面反映事物的本质，是理性认识的初级阶段。到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将思维抽象得到的许多规定加以综合，把客观事物内部的许多方面的本质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思维具体，从而更系统、更全

面、更深刻地反映了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将思维运动的这两个阶段归纳为两条道路，他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103}。只有到这时，人们才能真正认识所考察对象的具体本质。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规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不可能凭感官直观，而只能在逻辑思维的抽象中加以把握。因此，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对史学研究便具有重大的意义。离开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可能建立完备意义上的历史科学。

在史学研究中使用“从具体上升为抽象”方法，指的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做出科学的抽象，形成历史概念、历史理论、历史规律。但是我们的研究过程到此还只是完成了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回过头来，使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运用已经掌握的历史概念、历史理论、历史规律的学说，去研究和认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丰富多样的历史，科学地阐明这些历史的特性和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再现历史的认识任务。

以上几种逻辑方法，是史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可以先熟悉这些最基本的方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熟悉并掌握史学研究的其他方法，如历史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微观与宏观研究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和跨学科史学方法，等等。更重要的是，要在教学之余，结合自己在教学和阅读史籍中遇到的问题，亲自做点研究，写些史学论文。实践出真知，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真正熟悉和掌握史学研究的方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列宁. 列宁全集：第2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8-3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23.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4.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891.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8] 章学诚. 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 [M]. 章氏遗书本.
- [9] 庄周. 庄子养生主 [M]. 六子全书本.
- [10] 章学诚. 文史通义·博约中 [M]. 章氏遗书本.
- [1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6.
- [12] 陈梧桐. 朱元璋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 [C]. 明清论丛（第17辑）. 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2017.
- [13] 万明.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4] 张显清.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15] 陈梧桐. 与中学教师谈论文的写作——以中学历史教师为例 [J]. 课程·教材·教法，2017（8）.
- [16] 陈梧桐. 朱元璋研究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54-78.
- [17] 顾诚. 明末农民战争史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1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99.
- [1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51-952.
- [20] 陈梧桐. 正确阐述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J]. 课程·教材·教法，2008（3）.

（责任编辑：李 洁）

（下转第99页）

[15] 钟启泉. 综合实践活动: 涵义、价值及其误区 [J]. 教育研究, 2002 (6): 42-48.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3): 15-22.

[16]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J]. 北京大学学

(责任编辑: 周国华)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Through the Unified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Lang Di, Zhang Donghang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hangchun Jilin 1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unified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have rich and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part of “two-line components” emphasizes cultural spirit and education style; the part of “complement system”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selection based on the familiar context; the part of “thinking and exploring” helps students get clear understandings of the speculation and creation of culture. In the unified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the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s used to conve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so as to reflect the inherent historical, rational and practical features of the textbooks. Four strategies are emphasized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through textbooks. In terms of the educational values, it embodies the unity of culture and truth.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contents, it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elegance and vulgarity. In terms of the textbook structures,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filtration of pragmatics, style and life logic. In term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it establishes a self-consistent cultural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unified textbook;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
(上接第 91 页)

Basic Competencies of the Subject Which Middle School Teachers Should Possess: Taking History Teachers as an Example

Chen Wuto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o teach the courses well and become qualified and even excellent teachers, history teachers in middle schools should possess basic competencies of the subject, which are, mastering the historical theory of Marxism especiall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ving basic historical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grasping the basic context of its development and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procedure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logical method